



台南出生 三級貧戶

我是台南官田人，父親陳松根，母親李慎。官田舊稱「官佃」，原來有人字旁，後來才把它去掉。早在鄭成功時代，那裡就是屯墾區，民間須向官府租佃，所以稱為「官佃」。我們村莊不遠處，有一個地方叫做「葫蘆埤」，上面立有一座漢番界碑。我擔任總統時，曾請台南縣長蘇煥智⁷稍作整理、加以保存。這代表我們村落附近，過去一邊是住漢人，一邊住「番仔」，也就是今天說的原住民，更精確的說，就是平埔族當中的西拉雅族。

我的故鄉西庄，姓陳的佔三分之一，其中又有四分之三是我的宗親，也就是陳烏的後代。清朝時代，西庄隸屬於台灣府諸羅縣開化里二太爺庄，後來才改為「西庄」。我讀的隆田國民學校⁸，在日據時代不叫「隆田」，而是「番子田」，所以我的同學裡面，有很多長得和我不太一樣，不但皮膚黝黑，眼窩較深，而且身體強健。在當時我不知道他們是原住民，只知道他們住在番仔婆庄。後來才知道什麼是番仔婆，就是西拉雅部落信仰的阿立祖⁹，阿立祖是女性。事實上西拉雅跟很多原住民族一樣，都是母系社會。從番子田、番仔婆庄、漢番界碑的例子，就可以了解到我們村落這邊住的是漢人，另一邊則住所謂的番人，而且縱使早期有界碑，但我相信絕對不是河水不犯井水，彼此一定有來往，甚至通婚。所以我到底是閩還是客，是漢還是……，完全搞不清楚了，這就是台灣的民族大融合。

父親生於 1928 年，在我因「蓬萊島案」¹⁰出獄後的 1987 年 12 月 8 日過

世。小時候家境貧寒，父親做佃農，跟隔壁村的鄭姓地主承租土地，不到兩分地，收入非常有限，根本無法養活一家大小，所以有時候就要出去打零工。傳統農業社會採收甘蔗時，有人負責砍甘蔗，有人負責綑綁，然後再用牛車送到台糖鐵道西庄站。西庄再過去就是隆田，所以唸台南一中時，我上學會先坐小火車（五分仔車）到隆田，再換大火車，也就是縱貫線到台南。

父親有時去綑綁甘蔗，做零工賺點外快，那是季節性的工作，所以其他時間就幫人插秧種稻。在當時的農村社會，除了地主、公教人員、開碾米廠或雜貨店的人以外，大部分都是過這樣的生活。後來村落附近開了一家食品加工廠，母親和妹妹就到那裡做工。慢慢地，又進入到「客廳即工廠」的年代，所以我家三合院大廳旁邊空下來的房間，就拿來放紡紗的機器，母親和還在唸書的妹妹就會去紡紗，貼補家用。

小時候家裡也養豬，豬圈旁邊是飯廳，以前三餐都吃不飽了，哪有可能給豬吃得好，所以妹妹就要去斬切番薯葉；由於當時重男輕女，我不用做這些事。並不是說我比較會唸書，家裡人比較疼我，像我弟弟書唸得不好，也不用做家事。我認為還是傳統上重男輕女的關係。我們鄉下，一般人的觀念是，女孩子的學歷不重要，反正以後都要嫁人，找個好丈夫就好，不需要讀太多書。像我母親只讀到國民學校三年級，她阿公就說不用唸了。而我妹妹比較會讀書，所以讓她唸師專，但隔壁的姑婆說：「女孩子讀那麼多書做什麼，最後還不是一樣要嫁人！」但我父母認為，如果不讀書，以後就會和他們一樣做零工，甚至沒有工作，所以堅持讓她唸。何況唸師專因為公費，就算家裡貧困，還是有辦法供她唸書。當時鄉下有很多觀念其實都非常守舊，要是不去突破，有時候真的很難出人頭地。

除了斬切番薯葉以外，我們也會跟人家買「豆圈（khoo）」來餵豬。豆圈是由豆渣壓製而成的，但買了沒錢付，就要等到豬賣掉才能去付錢。就這樣到處賒欠菜錢、米錢過日子，所以我家房間就有一面寫滿阿拉伯數字的牆，只有數字沒有漢字、卻有如帳簿一般，紀錄著向人借貸、賒欠的情形。

我們村落的對面是曾文溪，到了冬天每個家庭都會到溪埔地種菜，可是每到夏天那裡一定會洪水氾濫。由於沒有柏油路，除了少數是碎石子路以外，大部分都是泥土路，所以下大雨或颱風侵襲，整個村落就會泥濘不堪。而且每個家庭的庭院很少是用磚砌成或水泥鋪成，唯有我家因為伯父在日本時代當過警官，所以家裡裝潢得比較現代化。我家原先牆壁下半部是磚，上半部則是竹編，然後再用泥土砌成（所謂半堵），左鄰右舍有些還是純粹的土角厝。後來伯父住的那邊修建成磚仔厝，到我當律師以後，我們這邊也修建成磚仔厝，所以現在官田的老家就是磚仔厝。伯父只有國小畢業，他在派出所是從工友做起，後來因為上進考上警察，到最後（國民黨政府時代）做到一線四的巡官，是我們陳家比較出人頭地的長輩。

1994年競選台北市長時，我出了一本《木瓜乾與大冰箱》¹¹的文宣小冊子，「木瓜乾與大冰箱」的故事，就是在說我們三級貧戶出身的小孩實在很俗氣、沒有見過世面。烏魚子現在雖然很普遍，但是在我們那個時代，我一直做到律師，還不知道什麼是烏魚子，當然也沒有看過冰箱。我當律師的時候，有一次我的客戶送給我一盒烏魚子，我不曉得那是什麼東西，竟把它當作木瓜乾，我拿回家還問太太：「人家送我們木瓜乾要做什麼？」大學的時候，有一天我到女朋友租住的地方，看到房間裡面的「達新牌衣櫥」，我就說你們家的冰箱好大！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冰箱。所以參選市長時，我就用這12個小故事組合起來，好讓民眾認識到我的另一面，可以說那本小冊子是一本成功的文宣。

成績優異 作文在行

從小我的成績就很好，父親只有小學畢業，母親也只讀到國民學校三年級，他們沒辦法教我什麼；但是父親很會畫圖，小時候會教我畫畫，這點我還有印象。我沒有唸幼稚園，就直接進了小學，唸的是隆田國民學校。上課第一天，我就吵著要老師發教科書，結果被啟蒙老師楊寬雲責罵，因為以前從來沒

有看過書，聽說有課本，就吵著要。

國校畢業時，以第一名的成績榮獲縣長獎。我是第十八屆畢業生，那屆剛好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由縣長親自參加畢業典禮，所以我是從胡龍寶¹²縣長手中領到縣長獎的，為此母親還買新衣服讓我上台領獎，那張照片在過去很多刊物上都可以找得到。獲得縣長獎對我影響很大，我的同學裡有家裡做木屐的、開西藥房的、開旅社的，也有不少是軍人子弟，穿的衣服都很體面、多變化，我們鄉下小孩根本無法和他們相比，只能好好唸書。

唸到高年級時，導師陳家城為了鼓勵我們，就說：「月考考六科，只要考600分，我就帶你們去台南玩。」我真的拿到600分，老師就帶我去「沙卡里巴」（盛り場）¹³吃台南小吃，然後帶我去看電影，這都是我平生的第一次。母親聽到老師要帶我去台南，覺得是大事情，又給我買了新衣服和新鞋子。在

「沙卡里巴」，我吃了魚丸湯、炒米粉和棺材板，這都是第一次的經驗，接著老師帶我去看電影。以前我從來沒到過真正的戲院，在鄉下雖然有戶外的電影，但沒有機會去看，到麻豆的電影院更不可能，所以那也是平生的第一次。印象中電影是洋片，演的是「賓漢」，只知道是大場面的，劇情是什麼，小孩子根本看不懂，看了五分鐘我就睡著了。

國民學校畢業前，學校要建圍牆，就要家長樂捐，像我這種家庭怎麼有可能捐獻給學校，所以只有有錢的家庭捐錢。其中有一位就是之前提到家裡做木屐的，捐得比較多，他的兒子是全校第三名，後來竟然可以保送。當時我們還有保送制度，照理說第一名才可以保送進初中，每個學校只有一名，像許添財¹⁴是渡拔國小縣長獎畢業的，所以他可以保送，而我應該也要保送，結果卻是家裡捐比較多的同學獲得保送，我只好去參加初中聯考。

聯考時考場是在曾文中學初中部（今「麻豆國中」）的第一間教室，我坐在第一個位子，實在很麻煩，因為很多來參觀或監考的，都從第一間教室看起，我剛好又是第一個位子，所以緊張得不得了。好在後來有考上，不然拿縣長獎的沒考上，一定會被人家笑。

曾文中學一年級一共有八班，忠孝仁愛信義和平，我被分到愛班，許添財是我的同班同學。因為我們教室的旁邊就是圖書室，借書很方便，從那時我就開始接觸一些課外讀物，再加上國文老師方棣華教得很好，我的作文因此進步得很快。印象中，一年級時，我們9月開學，剛好那（1963）年11月美國總統甘迺迪（John F. Kennedy）被暗殺，國文老師就要我們寫作文，題目是「一位美國總統之死」，但我們怎麼可能會寫，所以老師就要先跟我們講甘迺迪的故事。我第一次寫到跟政治有關的文章就是在初一。

我在國小以前，課外書看得很少，印象中二、三年級時，教室旁邊雖然是閱覽室，但擺的都是《諸葛四郎》等漫畫書，看那種書作文怎麼可能會進步？所以當時老師給我的作文評語是「拖泥帶水」。上了初一，作文才開始有顯著的進步，因為教室旁邊就是圖書室，加上國文老師也教得很好，因而激發我的作文潛能。

麻豆國中的前身，是曾文中學初中部，是我們曾文區附近最好的學校，也是麻豆鎮內、官田、大內、六甲，甚至下營的學生都想考進去的第一志願，就像台南一中是台南地區最好的高中，曾中在台南縣算是很好的學校。就以考上台南師範來說，差不多有一班都是曾中畢業的學生，可見曾中以前確實辦得不錯。

在曾中的第一個學期，我就得到一年級400多位裡面的第七名，到了下學期，我就變成第一名。當時有的同學還要補習，我太太吳淑珍也是，但我從最鄉下的西庄出來，沒有補習，還是有辦法唸到第一名。對我們西庄來說，麻豆算是都市，但我有辦法唸到第一名。一樣的道理，對我們麻豆的來說，台南也是都會，我到台南一中唸書，和來自台南地區優秀的年輕朋友相比，還是有競爭力，還是唸到第一名；再到台北，面對的競爭對手更強，但我還是有辦法拿到第一。就這樣，在整個奮鬥的過程中，我一直在自我挑戰、自我超越，一步步出人頭地。

到曾中讀書，我都是騎腳踏車。小時候從西庄到隆田國校，有好幾公里

遠，剛開始赤腳走路，到後來穿鞋子走路，再到後來就騎腳踏車上學，上初中以後，也是每天騎腳車到麻豆唸書。但是遇到下雨的時候，騎腳踏車不方便，我就坐小火車去上學。台南一中時，一樣是通勤，沒有住校，因為住校要錢，而且住校大部分是為了補習，我沒錢住校，也沒錢補習，所以還是通勤。我記得高三時好像住過一個月，但我沒辦法補習，只是住在那裡，但住了一個月後就沒錢了，我又回到通勤。以前我都騎腳踏車到隆田，然後坐大火車到台南，再步行去台南一中。

在隆田國校時，一個年級有三個班，依能力分班；三班裡面，甲、乙兩班是升學班，丙班是放牛班。由於是戰後嬰兒潮，每家平均有四個小孩，所以家裡附近都是同學，像我們升學班一班就有 4、50 人，放牛班則塞了 70 多人，反正他們也不升學了，學校就給他們一個菜園去種菜。至於在曾文中學，則分八個班，前四班是能力分班，後四班是常態分班，所以忠班是成績最好的班級。

國民學校時，我的作文曾被評為「拖泥帶水」，但上了初中以後，我的作文成績開始突飛猛進，進到二、三年級，作文一直都維持得不錯。平時我代表班上參加校內的作文比賽，都拿到第一，所以三年級時，也就是 1965 年，台北還沒改制成院轄市的時候，我就代表台南縣參加台灣省第一屆國語文競賽。比賽之前，我先參加學校的比賽，得到了第一名，接著參加麻豆鎮的，又是第一名，然後再參加台南縣的初賽、複賽，都拿到第一名，最後參加全國的比賽，獲得第二名。以前的作文題目都是反共八股，我還記得很清楚，縣內初賽的作文題目叫做「我們的國父」，而複賽則是寫「領袖與國家」，但這種類型的題目，我還是有辦法拿到第一名。等到全國比賽時，作文題目就不是反共八股了，而是「看報」。雖然我沒看過多少報紙，我還是有辦法寫得出來，甚至拿到全國第二名。第一名我記得是新竹縣，台北市則是第三名。20 多年以後，我兒子在唸介壽國中三年級時，也去參加同樣的國語文競賽，他比我更厲害，他得到國中組的第一名。當時台北市分四區，他代表台北市東區，到台南參加全國性的國語文競賽作文組，拿到第一名，真的很不容易。

初中畢業後，我沒有直接去唸台南一中，因為沒有錢，但學校有提供獎學金，所以就直升高中部。高中部只有兩班，學校為了提高升學率，就鼓勵我們這些成績好的學生留下來。我記得一個學期獎學金有 300 元，兩個學期 600 元。高中時，我曾經去參加救國團的作文比賽，適逢中國大陸發生文化大革命，所以作文題目是「紅衛兵是中共送葬的吹鼓手」。只能說國民黨的教育真的很成功，我才有辦法寫出這些反共八股。以前也少有機會看課外書，報紙頂多是看佈告欄上貼的《國語日報》、《中央日報》或地方上的《中華日報》。